

文選學稿集

郭穎衡題



趙福海

主編



文选学论集 WENXUANXUELUNJI

赵福海 主编

责任编辑：张秀枫	校 对：魏淑琴	装帧设计：尹怀远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号)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	13.375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装订	印数：平装800册	定价：平装7.1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精装200册	精装9.10元

ISBN 7—5387—0469—8 / I · 422

目 錄

前 言	(1)
再談“選學”研究的新課題	許逸民 (11)
跋日本古抄無注三十卷本《文選》	屈守元 (19)
《文選集注》與宋明版本的李善注	岡村 繁 (37)
李善的《昭明文選注》與徵引的訓詁體式	
..... 王寧 李國英	(56)
論《文選》五臣注的重大貢獻	陳延嘉 (68)
兩部重要的“李注引用書目”研究	劉奉文 (87)
《文選》英譯淺論	康 達維 (98)
讀《文選》劄記	曹道衡 沈玉成 (111)
賈誼賦小考	王更生 (124)
向子期《思舊賦》研究	呂 凱 (134)
試談《文賦》抄本的系統	興膳 宏 (146)
《洛神賦》的創作及其寄托	羅敬之 (155)
《文選》諸本任昉作品稱呼的混亂與	
《奏彈劉整》的原貌	佐竹保子 (173)
時代與總結	
——《文選》出現的時代	何茲全 (183)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與蕭統的文學批評	陳復興 (187)
從《文選》選篇看編纂者的文學觀	

.....	清水凱夫 (200)
傳統文化心理的獨特表達方式	
——論《文選》次文的豐富意蘊	劉樹清 (216)
風教與翰藻	
——蕭統的文學趣味和《文選》的選文趨向	
.....	顧 農 (232)
昭明太子與梁代中期文學復古思潮	劉躍進 (246)
關於《文選》的正名	周奇文 (262)
《選·賦》情類的編設與蕭統艷情態度的透視	陳向春 (273)
文章淵藪 英華薈萃	
——論《文選》的文學價值	穆克宏 (282)
美文的時代與時代的美文	
——論《文選》的基本藝術特徵	趙福海 (300)
論《文選》對傳統文化的選擇	鍾兆祥 (318)
“文選理”與唐詩	李 暉 (333)
試論《文選》的分類	王存信 (350)
“文選學”之文類評點方法	游志誠 (363)
蘇州“選學”述略	范志新 (385)
大陸館藏“選學”善本書錄	呂桂珍 (398)
論《文選》的“畋獵”賦	何沛雄 (421)
《文選注》的文學批評	楊 明 (422)
《四子講德論》之體類探索	白承錫 (423)
《文選》貯存的六朝“當時語”的價值	呂正華 (424)

前 言

這是一九九二年“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翻開目錄或曰：眼花繚亂。無論這批評含褒含貶，都是中肯的。因為它至少揭示兩個事實：一、“選學”是個“富礦”，它蘊藏着極為豐富的瑰寶；二、“選學”研究，目前尚未進入就某一方面集中深入探討的階段。

“文選學”是古老而又年輕的課題。說古老，它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說年輕，寂寞半個多世紀的“文選學”，重新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中國大陸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事情。

錢鍾書教授說：“曹憲、李善以降，‘文選學’，專門名家。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成‘許學’者，惟‘《選》學’與‘《紅》學’耳。”（見《管錐編·全梁文卷十九》）“文選學”興起於隋唐，鼎盛於有清，其間雖有浮沉，然相延不廢，可謂淵遠流長。最早治《選》者是隋代蕭該。該為蕭統侄輩。蕭該治《選》屬於家學，他著有《文選音義》，但早已亡佚。繼該後治《選》卓有成就者，首推隋末唐初的曹憲。隋煬帝時曹憲作過秘書學士，經常招徒授《選》，學生數百人，甚至“公卿之下，亦多從之受業。”他撰著的《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可惜亦早亡佚。曹憲之後，治《選》者伙矣，而為“選學”鋪下第一塊基石的是李善。善與曹憲同鄉，並受業於憲。李善集《文選》研究之大成，作《文選注》，並將原書三十卷析為六十卷。唐顯慶八年（658）上《文選注表》，高宗下詔稿本藏於秘閣。李善學識淵博，曾任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

侍讀。後因賀蘭敏之事受牽連，“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文選》），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新唐書·李邕傳》）李善在講授中，不斷增刪其注。據李濟翁《資暇錄》載：“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復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現在流行的版本，蓋為李善“絕筆之本”。李善注已成了《文選》不可分割的部分，“文選學”的內容也逐漸擴展為“注釋、辭章、評論、廣續、校讎”（見駱鴻凱《文選學》）諸方面。

自唐至清，“選學”一直為傳統學科。宋、元、明各代，雖有漲落，但從未終斷。宋初承襲唐代辭科取士之風，甚至題從《選》出，使《文選》尤獲重於藝林。後來適應變法的需要，科考由重辭賦轉為重策試，“選學”遂衰，然飽學之士，仍不廢《文選》。其特點由注重研讀，轉為考訂，更有學術味道。宋代“選學”專著不多，在其他雜著中，往往存《文選》考證若干條，多數引證詳明，頗有價值。宋代對“選學”發展的最大貢獻是在版本流傳方面。元代尚武而不尚文，但評釋《文選》者亦有數家。明代定制以“時文”（八股文）取士，“選學”不振。其“選學”著作，或匯集前人注釋，或輯錄《文選》麗辭，或對前人之注再加疏解，在學術上雖無突破，而在《文選》的解讀上有貢獻。

清代是集我國封建社會學術之大成的時期。它對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進行了一次大總結。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對《文選》的研究，無論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都有新的突破。清代的“選學”研究，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小學”與“選學”互相推進。《文選》以詩賦為主，而賦與“小學”同源。入選之賦家，有的本人就是文字學家。郭璞有《爾雅注》，揚雄有《方言》。到了清代，特別是乾嘉學派，小學發展鼎盛，而小學家對詞旨深奧、義蘊宏富、徵引浩繁的《文選》更加關注。如段玉裁、郝懿行、王念孫、

朱駿聲、阮元等常在他們的小學專著中引用《文選》。或引文以證己見，或引文糾謬前賢。《文選》為清代“小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語言材料；“小學”的蓬勃發展又推動了《文選》微觀研究的深入。第二、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專門治《選》或涉獵《文選》者，有古文家、駢文家、史學家、經學家、小學家、校勘家、文章家、文論家，研究的角度雖不相同，但他們結論綜合起來不僅推動了“選學”研究的深入，而且為繼續發展“選學”，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第三、與此相聯系的是“選學”家隊伍的龐大，“選學”著述的宏富。張之洞認為，清代小學家、駢文家皆深通“選學”。他在《書目答問》中，設“選學家”之目，列“選學”著作者和校勘者就達十五家：錢陸粲、潘耒、何義門、陳景雲、余蕭客、汪師韓、嚴長明、孫志祖、葉樹藩、彭兆蓀、張雲璈、張惠言、陳壽祺、朱珔、薛傳均。駱鴻凱在《文選學》的《選學書著錄》中，更增至三十六家四十一部“選學”著作。

梁代編定的《昭明文選》，幾乎哺育了其後所有的詩文大家。杜甫幾次教育他兒子要“熟精文選理”。韓愈領導古文運動，尚散黜駢，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譽，然而他並不廢以駢為主的《昭明文選》，在給李邢寫的墓志銘中，他稱贊李邢能記誦《文選》。李詳撰著的《韓詩證選》，說“韓公之詩引用《文選》亦伙。”稱“韓公熟精選理，與杜陵相亞。”宋代更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選學’的產生和它的幾度興盛，說明了《文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已被確認，它的價值已被發現。”（《昭明文選譯注·陸序》）

從文學史角度研究，《昭明文選》是我國現存第一部“選錄式”文學史。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第一章緒論說：

寫的哲學史約有兩種體裁：一為敘述式的；一為選錄式的。西洋人所寫之哲學史，多為敘述式的。用此方

式，哲學史家可盡量敘述其所見之哲學史。但其弊則讀者僅讀此書，即不能與原來史料相接觸，易為哲學家之見解所蔽；且對於哲學史家所敘述亦不易有明確的了解。中國人所寫此類之書幾皆為選錄式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即黃梨洲所著之宋、元、明哲學史；《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即姚鼐、曾國藩所著之中國文學史也。用此方式，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選錄各哲學家各文學家之原來著作；於選錄之際，選錄者之主觀的見解，自然亦須攙入，然讀者得直接與原來史料相接觸，對於其研究哲學史或文學史，易得較明確的知識。惟用此方式，哲學史家或文學史家之所見，不易有有系統的表現，讀者不易知之。

《昭明文選》正是這樣一部選錄式的文學史。自周、秦、漢、魏至晉、宋、齊、梁八代，《文選》共收錄作品近七百首，署名作家 129 位。在思想上不限一家，在藝術上不拘一格；歷史縱向呈現發展變化，時代橫向表現千差萬別，基本體現了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脈絡和流變。

周代除《選序》明確不選的《詩三百》外，堪稱文學并有深遠影響者是屈、宋的作品。《文選》共收錄了 13 首（《九辯》以一首計）。劉勰稱“秦世不文”（《詮賦》），昭明專錄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因其是“駢體初祖”。兩漢的代表文學樣式是漢賦。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所列的辭賦十杰，有八人是兩漢的辭賦家：“枚乘《菀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鵬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兩都》，明綯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除《菀園》外，劉勰所舉之賦皆入錄《文選》。雖然沒選枚乘以賦名篇之作，而入選的

《七發》實際也是賦體。上述賦家與賦作，縱橫觀之都能代表漢賦的發展與成就。

沈約的《謝靈運傳論》，可視為以聲律論為中心的文學史綱。蕭統將其編入《文選》，並以其為選錄作品的史的綫索。沈文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考察選篇不難看出，漢魏這段文學史，是以西漢的司馬相如、東漢的班孟堅以及魏的曹植和王粲為三極的。他們在《文選》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同樣占有重要地位。後人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大體沒有超越《文選》勾勒的輪廓。《文選》不僅保存下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也燭明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綫索。“我們試想想看，假如沒有《文選》這部書，我國文學界，是何等的黯淡。要正式認識中國文學，還有那一部書比《文選》更可以作中心的標準么？”（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見《中國文學八論》香港南國出版社版）

從文學理論角度研究，《昭明文選》是一部具有民族特點的文學批評著作。《文選》的價值，不獨在文範，而且在文理。杜甫重視“選理”，正是看到了《文選》通過選篇體現的文學理論的意義。我國的傳統文學批評與西方不同，系統的嚴密的理論闡述少，“就事論事”者多，具有示範性、形象性，因此選錄、評點、序跋便成了主要的批評方式。

前人將《昭明文選》與《文心雕龍》對比觀照，也正是看到了它的理論價值。明代的胡應麟說：“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綽之評，議論精鑿。”（《詩薮》）清代的孫梅說：“昭明太子纂輯《文選》，為詞宗標準；彥和此書（《文心雕龍》），實總括大凡，妙抉其心，二書宜相輔而行也。”（《四六叢話》）近人黃侃說，《昭明文選》與《文心雕龍》“鐘磬同音”。我們研究“選序”，透視

“選篇”，對《文選》的文學批評觀點，就會看得更加明晰。《文選序》開篇引《易經》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時義”的觀點是整部《文選》選篇與編排的基本指導思想。“時義”應包括：第一，要有時代內容，要反映時代文學的主導方面。第二，要有教化功用。但并非狹隘的政治功利主義，而是既重視“文”的教化功能，又承認“文”的審美特徵，肯定其“娛耳”、“悅目”的作用。第三，堅持發展的觀點。《選序》以“錐輪”與“大輅”、“積水”與“層冰”為喻，說明文學的形式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趨勢是“變本加厲”、“踵事增華”。“沈思翰藻”之說，正是這種趨勢的必然結果。因此選篇厚今薄古。周秦選錄 14 首，兩漢選錄 96 首，三國選錄 120 首，兩晉選錄 206 首，宋齊梁選錄 234 首。“由六朝而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實漢人之作）、屈平《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由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章學誠《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見王利器《文史通義校注》）

篇章的選錄上，編者也充分注意了文學批評的分量。凡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單篇文學批評著作，幾乎都選入《文選》之中。漢之前，我國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著作，《毛詩序》是第一篇詩論，被選入。魏文帝曹丕撰寫的《典論·論文》，有人譽之為“文學獨立宣言”，對文學的地位與作用，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文學的功能與文體的特點等都有新見解，也被選入。晉代陸機的《文賦》，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創作論，幾乎涉及到文學創作上的一切最重要的問題，“精語絡驛。”（《藝概·賦概》）也被選入。沈約的《謝靈運傳論》，是永明詩派綱領性著作，其對唐代律詩的成熟，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這些文論篇章的入選，充分地反映了編者文學理論觀念的自覺。

《文選》李善注也包含着豐富的文學批評內容。如謝靈運《從

斤竹澗越嶺溪行》：“情用賞為美，事味竟誰辨。”善注：“言事無高玩，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理幽味誰能分別乎？”注家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講審美過程的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李善的解釋抓住了謝靈運的審美觀：強調直觀感悟，蒙上一層或佛或道的主觀色彩。

又如《文賦》：“詩緣情而綺靡。”善注：“綺靡，精妙之言。”此非小學家之注，而是文學批評家之注。《說文》：“綺，文繒也，從絲，奇聲。”《漢書》集注：“靡，猶濃麗也。”《文賦》：“言徒靡而弗華。”善注：“靡，美也。”小學家注“綺靡”乃華美之意；而李善卻以“精妙之言”注之，可見其文學批評家的眼光。“妙”原是道家哲學中的一個概念。道家思想給予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影響是久遠而深微的。郭沫若先生說《老子》是一部“韵致深醇的”哲理詩，就連老莊的生活傳說也充滿了詩味和藝術味。人們形容文學藝術達到高超的境界叫“出神入化”。何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易》）“精妙”之“妙”，正是“妙萬物而為言”之妙。莊子認為，物之粗者可以言傳，物之精者只可意會，李善認為詩就應該具有可意會不可言傳之特點，即應該有言外之意，以復意為工。朱自清先生說：“妙的意念，經過漢代到了晉代成為士大夫或雅人一般常用的、主要的審美的評語。”（《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李善正是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待詩的藝術特徵的。

再如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善注：“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仍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我國創作傳統，既重視“秀”，又重視“隱”。劉勰《隱秀篇》說：“文之英蕤，有隱有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秀乃“窮形盡相”，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隱乃“義生文外”，令人回味無窮。“文外傍情”就是隱，李善對此加以肯定，

是很有藝術鑒賞眼光的。當然，李善注如漢儒解《詩》，比附歷史，牽合政治，硬找寄托之處也有，但這些淹沒不了注家文學批評方面的真知灼見。

從訓詁學角度研究，《昭明文選》開拓了由經學訓詁到文學訓詁的新天地。以“沈思翰藻”為特徵的《昭明文選》，其語言較之經學典籍要豐富得多，復雜得多。特別是“選賦”，連綿詞成堆，疊床架屋，雕繪滿眼，訓釋尤難。英國威利博士翻譯《文選》時驚嘆道：“將司馬相如這樣富麗的詞藻翻譯成另一種文字，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的筆下能寫出象這種滔滔不絕的富麗的詞藻。他能與語言文字嬉戲，正如海豚能與海洋嬉戲一般。”（康達維《歐美〈文選〉研究述略》）因此用注經的辦法來注辭藻富麗的《文選》，有時難以奏效。正如著名訓詁學家陸宗達教授所說：“專就《文選》的語言來說，書面語和口語夾雜，歷史上的經典文獻語和作家的習慣語并存，全民習用語和文學專用語并出，這種語言狀況，就會帶給整理者很多困難。舊‘小學’附庸於經學，而文學語言比先秦經典語言要豐富形象得多，熟悉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人，對付這種文學語言，有時並不一定有辦法。”（《昭明文選譯注·陸序》）而獨具特色的李善注，則在經學訓詁與文學訓詁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傳統語言學研究的目的是“通經致用”。張之洞《說文解字證序》說：“治經貴通義，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訓始；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但是《說文》並不能完全解決語義比經典復雜得多的《文選》的義訓。“漢代的訓詁是以注經為主要目的的。經書作為古代儒家思想規範的教材，要求釋義的準確性。而文學則以作者個人的視聽感受為內容，詞義、句義都更富主觀經驗性。特別是詩，它的豐富而朦朧的意境，它的細膩而深入的情感，都允許讀者憑借自己的經驗有各異的領會，這就要求釋義的模糊性。一

般的直訓和義界的訓詁方式，漢代章句的直譯其文，都不但難以完成溝通讀者與作者的任務，反而會把讀者的思路堵塞，以尋舊章而探來源的注釋方法注釋《選》文，效果確實是超出一般注釋的。”（王寧《李善的〈昭明文選注〉與選學的新課題》）大量用典是《文選》的重要特徵之一。據王寧教授統計，《文選》詩的涉典字數占 21.4%，每五個字就有一個字入典。李善正是從這一實際出發，把出典原，釋典義作為重要的注釋手段之一。釋典本身就是釋義。無論語典、事典，有時典源一出，其義自明。“釋事寓義”，不僅是注《選》所必須，也是李善對注釋學的一大貢獻。注典源不單是標明出處，“更重要的是以境比境，為讀者提供另一個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對選詩的體會。”如曹植《朔風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李善注引《毛詩·采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一位戍邊兵士歸來途中賦的詩。李善借這一為人熟悉的意境，啟發讀者理解《朔風詩》的意境。此詩是曹植為東阿王時所作。他遠離京都，遠離兄弟，只身東藩，思歸之意，同胞之情油然而生。這種意境很難用語言說清楚，以境比境，連類旁通，啟發讀者的聯想，調動讀者的經驗，則會加深對詩的領悟。暗示是詩的生命。無數優秀詩篇，所以能流傳千古，生生不息，就在於不同時代不同經歷不同文化層次的人，受到詩的暗示，會激發個人的審美情感，從而不斷深化詩的意境，創造詩的意境。這正是詩的精妙之處。古人講“詩無達詁”，恰好說中了詩的這一特點。任何一首好詩，都是詩人與讀者共同創作的。要求解詩如解經那般準確是辦不到的。詩不能準確，準確不是好詩。

李善注是一門大學問。它不僅幫助《文選》的廣泛流傳，而且“包含着很多文獻語言學和文學語言學的資料和原理”，它引書多達一千六百八十九種，在中國訓詁學史上素有“考證之資

糧”的美稱。“從李善注開始，“選學”除了具有以《文選》所錄的作品為中心的文學研究內容外，還具有了以李善《文選》注為中心的文學語言學內容。這部分內容兼有文學聲韻訓詁、考據學與注釋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總之，“文選學”是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礦藏，它深深地扎根於民族的土壤之中。盡管《文選》和“李善注”經過歷代發掘，然而“這個富礦還僅僅開掘了表層，用新思想、新方法來重新認識它，選取新角度來繼續挖掘它，這個工作應當說還剛剛開始。”（《昭明文選譯注·陸序》）

這本《論集》，編入從不同角度研究“選學”的論文和“提要”三十三篇。作者既有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學者，又有日本、美國、韓國的專家；既有皓首窮經的老一輩文選學家，又有剛過“而立”之年的新一代“選學”探索者。這說明，“文選學”早已超越國家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這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問，必將在日新月異的人類精神文明大廈中，成為光輝永駐的磚瓦！

《論集》的迅速順利出版，全賴諸方的大力支持。北京師範大學郭預衡教授為本書題寫了書名；時代文藝出版社副編審張秀楓先生兼程審稿，花費了很多心血；吉林文史出版社副社長孫寶文先生，為本書的印刷、裝訂精心籌劃。在此一并深致謝忱！

參考書目：

《文選理學權輿》（汪師韓撰 孫志祖補）

《文選學》（駱鴻凱著）

《六朝文學論文集》（清水凱夫著 韓基國譯）

《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趙福海 陳宏天 陳復興等編）

《昭明文選研究》（臺灣 林聰明著）

再談“選學”研究的新課題

許逸民^①

一九八八年八月，有幸在長春參加了首屆《昭明文選》國際學術討論會，拜讀了中外學者的數十篇論文，受教既多，感想亦復不少。後來我在大會上有個發言，對於“選學”研究的現狀（主要是我國的情況）和今後的研究課題，曾提出過幾點淺見。轉瞬間三年又過去了，而我國“選學”研究似仍處於冷冷清清的階段，未能緊步“龍學”（《文心雕龍》研究）後塵而出現較大的轉機。其實無論就漢魏六朝文學史研究來說，還是就古籍整理與研究來說，《文選》一書都已被冷落得太久了。這種情況顯然已影響到我們在文學史研究中無法全面認識南朝文學的價值，甚至無法歷史地評介唐以前文學發展的主流和精華所在。在古籍整理學領域，對《文選》的忽視也不利於版本學、校勘學、注釋學的自成體系的研究。總之，我認為振興“選學”乃是當前文學史研究者、古籍整理工作者共同的緊迫課題。因此，我想再次提出如下建議，以期引發同道者的共鳴。

一、“傳統選學”的任務有待於進一步完成

駱鴻凱《文選學》第三章敘述“選學”源流，自隋唐以迄于

① 作者：中華書局編審。

清代，總分為五家：一曰注釋，二曰辭章，三曰廣續，四曰讎校，五曰評論。五家各有傳承，所謂“隋唐以降，代有成書，而唐與清為最盛”是也。五家的著述概屬於“古籍”的範疇，稱之為“傳統選學”似無大礙。五家之中，有當時出于必要，而今天已不得不自行消亡者。如意在科舉而扶摘藻異的辭章家、竟尚標新而掇拾遺珠的廣續家，時過境遷，自然難乎為繼。至于注釋、讎校、評論三家，在今天不但不能消亡，反而需要發揚光大，不斷推陳出新，以適應當代讀者研究與欣賞的要求。我這裡所談的“傳統選學的任務”即指此三家而言，不過評論家更接近于現在的文學史研究範疇，可留待下文去談，這裡先就注釋與讎校二家面臨的若干新課題，擬為出目，逐一討論。

1. 《文選集校》 《文選》唐有鈔本，宋以來有刻本，版本至多。日本學者斯波六郎先生《文選諸本研究》一書，分為“李善單注本”、“五臣李善注本”、“李善五臣注本”及“舊鈔本”四大類，共列舉版本三十五種，實則現有版本遠不止此數。如今藏北京圖書館的宋淳熙八年（1181）池陽郡齋尤刻本（中華書局有影印綫裝本）、宋杭州開茆紙馬鋪鍾家刻本（存一卷）等，均不在斯波先生研治書目中。他敦煌遺書中的《文選》殘卷，所知已有二十四種，亦大多不見于斯波書目。目前學術界對於李善注早期單注本的存佚、李善注與五臣注的關係等問題紛爭不休，大抵都缺少版本學研究的依據。倘若我們能比勘眾本，詳尋異同，并在此基礎上正本清源，擇善而從，整理成一個定本，想必會大大有助於上述問題的解決，而且會為今後注釋、評論提供一個可靠的底本。

2. 《文選匯注》 匯注者，匯集前代舊注也。其做法不外兩種，一種是資料長編式，有聞必錄，一如游國恩先生主編的《楚辭注疏長編》（已出版《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另一種則是薈

萃精華式，對舊注斟酌去取，凡可通者存之，謬誤者棄之。不僅去取之間已體現出匯注者的眼光和識見，而且對於確有心得處，還可以加以按斷，直接寫出自己的觀點。這樣的匯注既可集舊注之大成，亦不失為具有當代學術水準的一家之言。據聞即將問世的《屈原集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出版）、《李白集箋注》、《杜甫集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等，均採取後一種做法。匯注工作是對“傳統選學”研究成果的一次總結，是一次基礎性的工程。

3. 《文選書錄》 自隋蕭該的《文選音》迄于近世黃侃《文選平點》，李詳《文選拾瀋》，其間著述不知凡幾。駱鴻凱《文選學》專有《選學書著錄》篇，著錄全注、刪注、校訂補正、音義訓詁、評文、摘類、選賦選詩、補遺廣續各類共 90 種，此亦不過舉例而已。為全部選學書目作提要，尚無人問津。書目之于治學，猶問途叩扉，至為切要。有《文選書錄》在，一則可見昔日選學研究之眉目，二則可知今日選學研究之門戶。我認為這項選題也應當先行一步完成。

4. 《文選新注》 如果說上面三項選題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專業工作者的話，那麼新注則要面對更多的讀者，通過疏解文義字句，滿足讀者批評和借鑒的願望。新注的體例應符合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詮釋宜詳明，但不可過多引錄書證，必要的引錄應取串講方式，十分緊要處始可摘引原文。這樣做無非求得通俗易懂，但如果注文過分簡略，語焉不詳，恐亦與初衷不合。

5. 《文選今譯》 新注與今譯本可以集于一書，只因如此一來，注則不能詳，而譯亦受注之牽累，不如分為二書，各司其職。新注的目的是要讀者在注的幫助下去直接賞析原文，今譯的目的則是要讀者連同譯文一并作賞析的對象。不同語種的翻譯作品，顯然是以譯文為賞析對象的。古代漢語譯為現代漢語，雖然不能完